

# 批評的癥結在哪裏？

• 吳 炫

一

讀趙毅衡和徐賁的文章(載《二十一世紀》1995年2月號)，引發了我一些相似和不同的感受。簡單地說，趙文的敏感在於：不管「後現代」話語與「回歸民間」策略在言說者初衷那裏有何差異，但就其客觀效果來看，對精英文化及其批判立場的消解則是共同的。這種「共同的」保守主義傾向，反過來又使兩者的差異(即趙文所說的「後」在西方原本是一種激進主義立場)顯得不重要，在某種意義上，還可能為中國文化的當代轉型設置一道無形的精神屏障。

至於「第三世界批評」，在我的印象裏，它只是90年代初幾家「獨白式」批評的一種，似乎還不具備徐文所說的「獨秀」的地位。但「第三世界批評」作為一種政治性太強的文化批判，不僅容易消弭第三世界內部的文化差異性，也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的差異方面加進了某些不必要的政治因素。正如徐文所說，「由於它的『對抗

性』批評只有『國際性』，沒有『國內性』，因而它不僅能和官方民族主義話語相安共處」，亦常常「順應了後者的利益」。其結果是，這種批評不僅難以在文化建設方面提供積極的話語成果，而且在事實上，它在消解國內政治性衝突的同時，在文化上只能導致對「本土文化」(所謂民族文化)的捍衛心理，從而與趙文所說的「保守主義」傾向殊途同歸。

真正可怕的問題或許正在這「殊途同歸」上。它所揭示出的問題至少比趙徐二文描繪給我們的問題更為根本：為甚麼中國知識份子只能在「激進」與「保守」間徘徊？如果過去的「激進」和今天的「保守」都有問題，那麼真正的問題在哪裏？真正解決這一問題的批評又應該是甚麼？

二

趙文雖然描繪出90年代中國大陸批評的共同保守傾向，但至少還有兩方

中國知識份子在採取一種學術和理論策略時，為甚麼常常會忽略在效果上出現的與政治合謀、被主流意識形態利用的可能？

面的問題是應該進一步思考的：

(1)為甚麼中國知識份子在激進主義之後會興起回歸保守主義的思潮？這個設問可以引發兩個問題：中國知識份子過去是在甚麼層面上搞激進主義的？或許正是蘊含在過去精英立場中的問題導致了今天的結果，因此這是一個十分自然的過程。這意味着我們不能僅僅注意到保守主義的傾向，還應該將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作為一個不可須臾分離的整體來看待，這有利於我們把握住中國文化批評思潮演變的一些實質性環節和問題。由這種追問引發出的另一個問題便是：如果80年代甚至百年來中國知識界的激進主義確實有毛病，那麼真正的激進主義應該是甚麼？在這個問題懸而未決的情況下，任何糾正激進主義的妙方事實上都可能導致「反激進」立場的產生，最後便喪失了對激進主義糾偏的全部意義，成為對激進主義的取消。這種「取消」在功能上看，至少與失敗的激進主義並無二致。

(2)中國知識份子在採取一種學術和理論策略時，為甚麼常常會忽略在效果上出現的與政治合謀、被主流意識形態利用的可能？這種忽略，究竟屬於知識份子理論思維方式上的病症(如「後現代」、「新寫實」，基本上尋求的是一種解釋現實而不是解決現實問題的途徑)，還是源於文人傳統某種習慣成自然的回歸性和妥協性(如無論是「舊國學」還是「新國學」，其參與者在早期多半採取激進主義的立場，這應視王國維為鼻祖)，抑或是在價值層面上力戒「浮躁」之風，尋求某種深層的文化土壤(民間)？但由於民間土壤本來在價值上就是魚目混珠的，價值的挖掘最後就很容易導致價值的消解……這種甄別之所以需

要，是因為它將直接導致對總體上的保守主義作更深層次上的不同的價值評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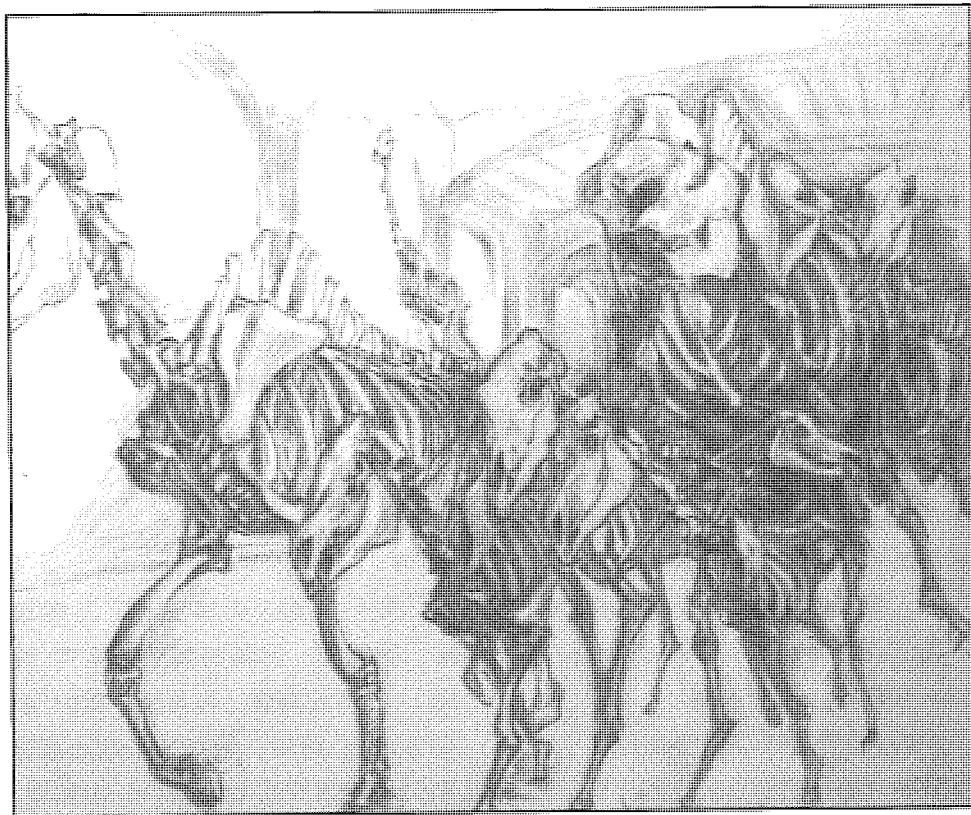
### 三

比較起來，徐文立論的一個基本前提是：只有與政治意識形態保持某種必要的對立性，知識份子的精英立場才能得到某種程度的實現。在百分之九十五的情況下，我想徐文的立論是可以成立的。但由此排除掉百分之五的可能性，則可能顯示出作者思維上某種盲點。如果官方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其根柢上與知識者為之努力的「文化轉型」正好在方位上是一致的，如果精英立場與政治權力話語的衝突在深層次上還是一種和文化傳統的衝突，特別是，當後衝衝突需要相當長的一個白刃化階段才能獲得文化轉型的可能的話，考慮政治權力話語的某種允諾，在中國這一特殊的政治條件下，就不完全是某種妥協性行為：不直接談論與政治權力話語的差異性看法，也就不能簡單被視為對政治權力話語對抗的迴避。某種意義上，不重視一種批判立場的現實功效性，或者僅僅滿足於過去所處的「邊緣人」位置，我想是否正是激進主義者今天應該反思的局限之一？也是我們今天應該修正激進主義的態度之一？

### 四

在我看來，分析激進主義為何在中國失敗的方方面面，是把握保守主義在中國為何會興起的重要前提。激

徐文立論的一個基本前提是：只有與政治意識形態保持某種必要的對立性，知識份子的精英立場才能得到某種程度的實現。可是，不直接談論與政治權力話語的差異性看法，並不能簡單被視為對政治權力話語對抗的迴避。



中國激進主義還有一種更深層次的保守，他們脫離不了對既定價值觀念的守護，必須不斷置換西方新思想才能保證自己的精英感受的忙亂狀態。因此，中國的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其實沒有根本的差異。

進主義的基本形象，是以西方話語為參照，在「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諸種行為中構成的。今天已經沉默的激進主義者一直對此堅定不移，但至少有以下三點懷疑是可以作為問題提出的：

(1)任何西方理論話語的產生，總是針對西方特定文明背景的問題而言的——話語與其批判對象及其關係密不可分。這即是趙文意識到但沒有展開的「西方社會內部價值平衡的需要，其普遍意義值得懷疑」的意思。馬克思主義、海德格爾哲學是這樣，人文主義、現代主義同樣也是這樣。因此，資本上升時期的原始積累，現代科技文明對生態平衡的破壞，中世紀教會制度對人的基本慾望的箝制，近代人文主義的「大寫的人」，就分別構成與上述理論話語不可分離的「否定對象」。將這些話語直接拿來確立自己相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立

場，實際上就已經剝離了上述話語的實際功效，其生硬性、教條性是上述話語在中國文化環境必定以悲劇結束的理論根源。這樣，當「後現代」之類的话語再被引入之後，它究竟「消解了甚麼」就會作為一個問題被隆重推出，甚至會出現「原本沒有價值的意義不值得去消解（如傳統倫理和專制主義），而正在確立的意義（如新的人文規範）又不應該被消解」這樣尷尬的景觀。

(2)中國現在的根本問題主要是由於傳統的延續而誕生不了新的文化型態——這個型態既不是西化，也不一定就是指現代化——現代化以及目前正在實行的市場經濟只不過是一種迫不得已的增強國力的選擇。增強國力與文化轉型是兩個不同層次的概念，前者並不一定以後者為前提，而後者卻不僅能保證前者的實現，還可以為世界作出新的文化貢獻。這

樣，文化型態的轉變只不過在其底蘊上是想和傳統、和西方不一樣。告別傳統的必要性，乃在於傳統價值體系不再能使我們在精神上有所依托，必須有新的價值結構來統攝已成為思想碎片的傳統價值材料，而和西方文化保持某種審視關係。並不是由於「後殖民」理論使我們覺悟到應該在文化上反對西方霸權，而是在於西方任何時期的思想體系都不可能真正成為在中國土壤中生成的東西。這種不能溶入性，是80年代西方各種思潮在中國只能造成短期震盪便趨於消失的根本原因。其根柢還是在於異域文化思想不能使我們的靈魂和精神獲得真正充實與安頓。

(3)我們之所以總是擺脫不了西方話語，與我們在思維方式上總是習慣尋求現成的觀念有關，也與黑格爾的「方法性否定」對我們精神上的制約有關。這種制約直接影響了我們對精英式批判的理解。真正的批判從來不是用一種現成的理論去批判另一種現成的理論，而是在對一切現成的理論的批判中，誕生新的思想結果。「後現代」在西方的精英性，是因為她在西方思想史上貢獻了一種新的對世界的理解才成為可能。從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到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再到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無不具有這樣的特徵。批評必須具有全方位性才可以稱之為精英，而這種全方位性批判又由於誕生了一個新的結果(思想符號或藝術符號)，所以又使精英和虛無主義不能等同。如果說中國激進主義還有一種更深層次的保守，在我看來就是他們脫離不了對既定價值觀念的守護，無法將自己置入面對中西方既定思想予以批判的位置，進而造成必須不斷置

換西方新思想才能保證自己的精英感受的忙亂狀態。對這樣一種「偽精英」，我在近十年的文學批評中一直是打上折扣的。也是在此意義上，我以為中國的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之間其實沒有根本的差異——他們都離不開對既定的文化思想體系的維護，在為新的文化建設貢獻自己的話語方面，當然就顯得軟弱無力。

## 五

另一方面，大眾文化、王朔現象、新國學、回歸民間和一系列「後學」，雖然在總體上有趙文所說的「新保守主義」傾向，但作為與政治話語和市場經濟有可能合謀的一股思潮，國內已有一批知識份子一直在做着激進主義立場的批判和抵抗(如張承志、張煒近期的作品和言論：「人文精神討論」；江蘇《批評》雜誌的創辦等)。只是，由於上述話語興起的複雜性，以及這些話語之間潛在的差異性，對其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細緻的剝離，可能是更為重要的工作。像王朔現象，對30年來的中心政治話語具有一種明顯的消解和調侃意味，但由於這種消解具有某種虛無主義和破壞主義色彩，所以你又可以说他在更深的層次上無形地銜接上老莊的虛無哲學和生存智慧哲學。像「新國學」和「新民間」，對80年代激進主義那樣情緒化批判以及移植西方話語傾向，有着十分顯然的反思意圖，但由於這種反思的「方式」，一是借助了國學大師們曾經嘗試過的已被證明有問題的「途徑」，二是借助了使政治話語得以「滋生」的「民間文化」，反思激進主義的初衷很可能最終就成為對「激進主義」

「新國學」和「新民間」，對80年代激進主義情緒化的批判，有着十分顯然的反思意圖。但反思激進主義不應該是取消激進，因為無論就中國目前的社會結構、政治體制還是精神文化而言，變革依然是首要任務。

的「懸置」。由於反思激進主義在本質上不應該是取消激進，而是尋求更有意義的激進——因為無論就中國目前的社會結構、政治體制還是精神文化而言，變革依然是首要任務。於是，就像「新儒學」試圖從儒學中開闢一條現代之路比較牽強一樣，從傳統中去挖掘自身變革的因素，起碼在理論上就很難言說清楚。對這個問題，我和郜元寶先生在〈關於美學和人文精神重建的通信〉中曾經交換過這樣的看法：如果「傳統」是指一切已經觀念化的精神文化、思維模式和審美習俗，那麼這層意義上的「反傳統」迄今沒有過時：如果「傳統」是指更深層次上的、難以說清楚看得見的、使一切現行文化模式誕生的那種人的敞開力量，那麼這種「傳統的傳統」，恐怕是「國學」和「民間」這兩個概念所囊括的內容所難以承擔的（《文論報》，1994.3.5）。由於中國民間和依附於此的學術，已經喪失了人的根本的創造性和否定性，與此相關的一切操作方式，最後都可能變成泥牛入海，甚至會造成「激進與保守」這個問題的取消。也是在此意義上，我認為當代知識份子僅僅反思激進主義是不夠的，還應該對反激進主義同時進行反思。在哲學層面上，這就是對一切已有的中西方思想果實和學人之路進行反思。在文化意義上，這種反思無疑將使我們嘗試開闢一種新的批評向度。

## 六

我特別想補充一點：在「激進」與「保守」之間徘徊——這種知識份子的生存運作方式，是我們今天更應有所警覺的。作為一個理論命題，社會

的發展需要「激進與保守」的相互衝突來突現，但作為一種生存形態的選擇，我們恐怕還不能以是否「激進」與「保守」來作為價值判斷的標尺。尤其是在中國現階段複雜的文化處境下，「激進內含保守，保守內含激進」，已成為90年代中期中國文化批評的一個特殊狀況。既然如此，問題就可能不在這兩個範疇本身，而在於在「激進」與「保守」背後，我們是否能發現真正的價值依托，或者是依據這價值來反觀中國知識份子生存運作的要害問題。在此意義上，世紀末的中國文化批評的首要任務，是知識份子在生存運作、思維方式、價值選擇等知識譜系上的自我清理與批評。知識份子固然應與官方意識形態和大眾文化保持必要的審視性與對立性，但這種審視與對立如果離開了知識份子在「話語」問題上的自我反思，那麼它就很難實現對立的現實功能，而且亦容易導致只有對立之「形」而無對立之「質」。中國文化批評從80年代至90年代，走的正是這樣的徘徊和浮泛之路。

在中國現階段複雜的文化處境下，「激進內含保守，保守內含激進」，已成為90年代中期中國文化批評的一個特殊狀況。

吳 炫 1960年生於南京。現為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副系主任、副教授。著有《否定本體論》(1994)、《否定與徘徊》(1990)、《批評的藝術》(1989)、《文學評論十面觀》(1986)，及論文多篇。